文化圆桌

忻州儒学与后晋刺史李继忠

□张明远

欲陈述忻州刺史李继忠其人的勋绩，必先追叙几段相关历史。

据欧阳修的《新五代史》载，后晋高祖石敬瑭为西夷沙陀族，其父臬捩鸡曾为后唐李存勖的部将，累功加中书令、河东节度使，镇守太原。清泰年间契丹侵境，后唐末帝李从珂命石敬瑭退守忻州，石敬瑭拒命未从，求救契丹并与之勾结。后唐灭亡后，石敬瑭受契丹主耶律德光册封为帝，国号晋，史称后晋。石敬瑭登基后，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，并每年献帛三十万匹，称契丹主为“父皇帝”，自称“儿皇帝”。石敬瑭在位期间，连年发生兵乱，且依附契丹，中原地区动荡不安。彼时吐谷浑活动于河东，对契丹造成威胁，石敬瑭因此受到责问，忧郁成疾而死，庙号高祖，谥号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，葬于显陵。

后晋前后共立两帝，所辖疆域包括太原府、河中府、绛州、晋州、慈州、隰州、沁州、泽州、潞州、汾州、辽州、石州、宪州、岚州、代州、陕州等地。据《忻县志大事记》载：“后唐庄宗同光元年，忻州归后唐，属河东节度使司。后唐明宗李亶长兴三年，李克用部将石敬瑭屯兵忻州。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三年、后晋高祖天福元年，忻州全境归后晋。”后晋前后十一年，忻州一直属其管辖。

接下来谈儒学的源流问题。东汉时期出现最早的公立学校，如同庠序、太学、国子监，区别于民间的私塾、义学等。忻州的儒学最早出现于后晋，有史料记载可证。其一，光绪《忻州直隶州志》云：“忻州儒学在治西南九龙岗，晋天福二年建。”其二，明代学者陈璧《成化重修忻州庙学记》云：“忻州庙学枕城坤隅之九龙岗，晋天福初建。”其三，《忻县志》曰：“后晋天福二年在九龙岗建忻州儒学学宫。”其四，《忻县志》又云：“忻州儒学始建于后晋天福二年，原址在治西南九龙岗上。”四处记载，时间地点一致。且据光绪《忻州直隶州志》载“后晋李继忠，嗣昭子，高祖时忻州刺史”，这句话指出李继忠是李嗣昭的儿子，后晋高祖时曾任忻州刺史，故笔者推测创建忻州儒学者，非李继忠莫属。

又据《忻州直隶州志》载，“后唐忻州刺史相里金，字奉金，并州人。为人勇悍而折节下士。同光中拜忻州刺史。是时诸州皆用武人，多以部曲主场务，渔蚕公私，以利自入。唯独金属、金工和贵重之物禁止部曲不与事，厚其给养，使掌家事而已。清泰三年，以金与太原四面步军都指使。晋高祖立为建雄军节度使，卒赠太师”，“李勍，忻州监军，周显德元年降。赵皋忻州刺史，周显德元年被害”。从这两段文字记载可知，后唐同光年间，并州人相里金任忻州刺史，清泰年间改任步军都指使。彼时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，镇守太原时被立为建雄军节度使，其灭掉后唐建立后晋，任命李继忠为忻州刺史，直至刘知远在太原称帝，建立后汉。后汉时期首任忻州监军李勍于周显德元年（954年）投降后周，刺史赵皋也被杀害。

《旧五代史》载：“李继忠，后晋继韬弟，字化远。从父李嗣昭征讨有功。后唐庄宗李存勖时历官成德军司马。后晋高祖石敬瑭时单隰泽三州刺史。继忠母杨善治产，积财巨万。高祖石敬瑭起兵于太原，杨已终。继忠举族家晋阳，时诸军方困，赖以取足。高祖敬瑭既济大事，感而奇之，故继忠连领大郡。”高祖起兵太原，灭掉后唐，李继忠在关键时刻大义凛然，舍巨金赈济军队，故得到高祖重用。由此可推测，继忠在忻州开创儒学时定是仗义疏财，慷慨解囊，正所谓“仁人者，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，也契合资料中所云：“凡俸给之余，与夫材用自公而入者，殆可以有为也。”

单从教育方面来论，李继忠其人便是忻州儒学的创办者，可惜跨越千年，一直无人以文翰形式追怀之，歌颂之。在忻州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，我们理应缅怀栽树荫人的前辈，揭开尘封，走出幽门，饮水思源，纪念这位历史先贤，俾其永远立于忻州教育史的舞台中，名垂史乘。

雅趣说字

说『暑』字

□金辉

白居易《苦热》诗云：“头痛汗盈巾，连宵复达晨。不堪逢苦热，犹赖是闲人。”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，酷暑严寒，日月运行，自然界之规律。自古以来，不少文人墨客挥笔感叹酷暑之烦。东汉繁钦写的《暑赋》，谈夏暑之酷烈：“林钟纪度，祝融司节。大火飘光，炎气酷烈。沉阳腾射，滞暑散越。区寓郁烟，物焦人渴。煌煌野火，喷薄中原。翕翕盛热，蒸我层轩。温风泱涊，动静增烦。”

其实，读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中对“暑”的解释，也能感受到《暑赋》中的情形，而且从造字过程中还可体味古人对暑之表达。甲骨文的“暑”字至今尚未发现，我们能见到最早的“暑”字是小篆，上下结构，由“日”“者”两部分构成。

先说“日”字。甲骨文中“日”是个象形字。不论甲骨文还是小篆的字形，其轮廓皆为圆形，就像天上高悬的太阳，一横或一点表示太阳的光辉，为“六书”中的象形字。“六书”是古人解说汉字结构和使用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类别，包括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。许慎给“六书”之一的象形字定义是：“象形者，画成其物，随体诘诎，日月是也。”简而言之，就是一看便能明白其字义，“日”字为最典型。

“暑”字小篆体

再说“者”字。“者”既是声旁也是形旁。“者”的甲骨文，好像木柴着火，火星四溅，仿佛在炊煮，即表示生火煮食或者围火言谈的意思，因此“者”是“煮”和“诸”的本字。也许现代人有点难以理解，其原因是随着社会发展，人们的生活内容日益丰富，“者”字的“生火炊煮”意思消失，造字者便另造“煮”代替；同样“者”为“围火言谈”意思消失后，再加“言”，另造“诸”代替。

因此，“暑”为顶着烈日饮煮，其酷烈之义甚明。这使人联想到杜甫的《夏夜叹》一诗：“永日不可暮，炎蒸毒我肠。安得万里风，飘飘吹我裳。昊天出华月，茂林延疏光。仲夏苦夜短，开轩纳微凉。”《说文解文》曰“暑，热也。从日，者声”，可理解为，暑天热如煮，天气灼热。酷暑时节，海滩上、泳池里人满为患，黑压压一片，如同锅里的水饺在翻煮。

古人认为“燠”是热之始，“暑”是热之极；“凉”是冷之始，“寒”是冷之极。再说说“寒”字。书法家林剑丹经常用战国三晋古文字书写“寒”字，古雅清秀之极，他认为，“寒”字不仅古气十足，而且有活灵活现的写实效果，就像是线条描绘，形象地表达了“寒”字的意思。

“寒”字就像房屋中间站着一个人，四周塞了几根茅草，令人想起寒风凛冽时，只得用茅草堵窗户，而人的脚还踩在冰块上，寒意不时袭来。林先生笔下的“寒”字，与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的“寒”字，同源近形。《说文》云：“寒，冻也。从人在宀下，以𡩠蔫覆之，下有仌。”

探源撷趣

古人的时间之美

□邵凤丽

晨曦初露，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，新的一天悄然开启。古人凭借卓越的才智，以一种近乎诗意的方式，将一日的光阴精心雕琢成十二个各具风貌的章节——十二时辰。这一时间划分制度在汉代已经萌芽，当时人们开始采用“十二地支”的顺序来标识一天中各个时段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一制度逐渐发展完善，并在唐宋时期广泛普及，最终成了中国人普遍使用的时间计量方法。

在十二时辰制度形成之前，古人采用的是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时称计时法。这种计时方法巧妙结合了太阳的运行、自然现象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规律，将一天时间划分为夜半、鸡鸣、平旦、日出、食时、隅中、日中、日昳、晡时、日入、黄昏、人定十二个时段。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在夜半（子时）人静、万籁俱寂之时，张继难以入眠，却意外从寺庙传来的钟声里寻得一丝心灵的慰藉，灵感迸发，创作出千古名句。

除了时称计时外，古人还使用漏刻计时法。“金炉香尽漏声残，翦翦轻风阵阵寒。春色恼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栏干。”王安石以漏刻计时法为背景，描绘了香炉烟尽、漏声将残的景象。漏刻计时法中的“漏”是用于计时的带孔的壶，“刻”是配有刻度的浮箭。漏刻分为泄水型和受水型两类。泄水型漏刻是水通过壶孔流出，壶内水位下降，浮箭随之下沉，通过观察浮箭上的刻度来判断时间的流逝。相反，受水型漏刻则是将浮箭置于接收水的壶中，随着水位上升，浮箭也会上升，以此来指示时间。

漏刻的发明让人们不需要频繁观测天文现象就能随时知晓时间，减少了对自然条件的依赖，标志着中国古代时间计量技术的一大进步。这种计时方法不仅精确度高，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。古代文人常常在诗词中提及漏刻，借以抒发内心情感。温庭筠在《更漏子·柳丝长》中说：“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漏声迢递。惊塞雁，起城乌，画屏金鹧鸪。香雾薄，透帘幕，惆怅谢家池阁。红烛背，绣帘垂，梦长君不知。”漏声与春夜的细雨、柳丝、塞雁等意象相互呼应，共同构成一幅寂寞与惆怅的深闺春夜图。

上面提到的两种计时方法——时称计时法与漏刻计时法，主要以太阳升起作为白天时间计量的开始，因此深受季节更迭影响，属于非匀定时间体系。这种时间体系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，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农耕社会的特性，人们遵循着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自然生活节奏。与

青铜漏壶

之相较，十二时辰制度则展现出更为精细且均匀的时间划分特点。它从夜半时分起始，将一日均匀切割为十二个时段，并以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这十二辰作为标记。十二时辰是通过观察太阳在一天中的视觉轨迹，利用其方位变化构建的一个既稳定又精确的时间框架。

十二时辰的概念最初起源于西汉时期式占和历算中的“日加”十二辰，也称作“加时”。不过，这一时间系统起初仅是理论性构想，未在社会中广泛普及。直到梁武帝对时制进行改革，将漏刻与加时相结合，创新性地提出了辰刻计时法，这才正式将十二辰作为时间的专有名词。这一新的计时方法后来被隋代官方历法所采纳，隋文帝增设“司辰师”一职，专门负责时间的管理。尽管如此，该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影响仍相对有限。唐代以后，随着计时技术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发展，十二时辰制度才逐渐普及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时间计量方式。

《宋史》中对当时白天的计时方式进行了详尽描述：“每一时，直官进牌奏时正，鸡人引唱，击鼓一十五声。至昏夜鸡唱，放鼓契出，发鼓、击钟一百声，然后下漏。”彼时，皇宫中负责报时的“鸡人”沿用唐代的唱词，清晨时唱道：“朝光发，万户开，群臣谒。平旦寅，朝辨色，泰时昕。日出卯，瑞露晞，祥光绕。食时辰，登六乐，荐八珍。禺中巳，少阳时，大绳纪。日南午，天下明，万物睹。日昳未，飞夕阳，清晚气。晡时申，听朝暇，湛凝神。日入酉，群动息，严扃守。”

十二时辰不仅精准细腻地描绘了古人对时间的把握，更体现了他们深邃的人生智慧。如果说子时夜色深沉，万籁俱寂，为新的一天铺垫宁静的序幕，那么到了丑时，金鸡初啼，太阳在地平线之下蓄势待发，光芒初露，新的一天即将拉开序幕。王安石曾在这一时间段勇攀飞来峰，只为亲眼见证日出的壮丽，并留下“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的传世佳句。到了寅时，旭日东升，岑参策马上五盘岭，“平旦驱驷马，旷然出五盘。江回两崖斗，日隐群峰攒”，阳光穿透薄雾，照亮了蜿蜒的江河与巍峨的山峦，构成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画卷。

在大诗人李白眼中，日出的景象别有一番韵味：“日出东方隈，似从地底来。历天又入海，六龙所舍安在哉。”李白认为太阳自东方升起，仿佛从地底而来，日复一日穿越天空，没入西海，这是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。他进一步感慨“其始与终古不息，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裴徊”，借此抒发对自然万物兴衰的哲思。最后以“吾将囊括大块，浩然与溟涬同科”，表达了自己超脱世俗的豁达心境。

在十二时辰的轮回中，午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标志着太阳达到一天中最高点。宋代文人苏舜钦在《紫阁寺联句诗》中说：“日光平午见，雾气半天蒸。”太阳高悬，光芒万丈，阳气旺盛至极，仿佛将大地的一切笼罩在明亮与温暖之中，雾气在阳光照耀下蒸腾而起。午时不仅是自然界阳气最为充沛的时刻，更在古人心中承载着特殊意义。古人认为，午时三刻阳气最盛，此时执行斩首刑罚，被认为可以迅速驱散阴气，这一观念在古代法律实践中有着深远影响。

此外，午时还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。古人有“日中为市”的传统，《易经》中载：“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”午时的宁静与闲适同样被文人墨客所青睐，王安石在《午枕》中以细腻笔触描绘了午睡的惬意：“午枕花前簟欲流，日催红影上帘钩。”阳光透过窗帘，红影斑驳，静谧而略带愁绪。而对于广大农人来说，午时则是他们辛勤劳作的见证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”

“百年鼎鼎世共悲，晨钟暮鼓无休时。”古代常以晨钟暮鼓的形式，宣告一天的开始与结束。唐代文学家白行简的《李娃传》云：“久之，日暮，鼓声四起……姥曰：‘鼓已发矣。当速归，无犯禁。’”酉时之际，夕阳西下，但依旧光彩夺目，陶渊明感叹：“日入群动息，归鸟趋林鸣。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。”

随着太阳落下，晚间的计时开始。北宋宫廷中将夜晚分为五个更次，从戌时开始，直至第二天寅时，“每夜分为五更，更分为五点，更以击鼓为节，点以击钟为节”。其中第三更对应的是子时，这也就是“三更半夜”的由来。“三更三点万家眠，露欲为霜月堕烟。斗鼠上堂蝙蝠出，玉琴时动倚窗弦。”三更三点时分，万籁俱寂，人们都已安然入眠，而露水凝结成霜，月光洒落，烟雾缭绕之中，斗鼠上堂，蝙蝠出没，为夜晚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活力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十二时辰，不仅是中国古代时间的诗意表达，更是中国人生活哲学的深刻体现。

郜继善 作